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5.014

历史、伦理与世情

——论梁晓声《人世间》的现实主义范式

孙桂芝¹, 王志萍²

(1. 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2. 昌吉学院中文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要: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建筑与历史记忆、代际与伦理承变、人性幽微与世情采写之间进行叙事架构, 历史、伦理与世情构成小说的核心元素。其历史书写, 以建筑群为记忆主体, 呈现时代变迁轨迹, 揭示阶层差异; 其伦理书写, 以公共秩序和家庭关系的代际叙事, 描摹出民间伦理的具体样态; 其世情采写, 直面社会痼疾与人性之恶, 弘扬传统伦理与民间温情。小说既具有现实主义创作“历史的”深度, 又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高度, 堪称现实主义范式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标杆之作。

关键词: 梁晓声; 《人世间》; 历史书写; 伦理书写; 世情采写; 现实主义范式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2)05-0114-07

引用格式: 孙桂芝, 王志萍. 历史、伦理与世情: 论梁晓声《人世间》的现实主义范式[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5): 114-120.

History, Ethics and Human Relationship: On the Realistic Paradigm of *A Lifelong Journey* by Liang Xiaosheng

SUN Guizhi¹, WANG Zhiping²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2.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Changji University, Changji 8311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writer of the novel *A Lifelong Journey*, Liang Xiaosheng tells historical memory by describing architecture, with which intergenerational ethic and subtle human nature constitut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History, ethics and human relationship constitute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novel. His historical writing takes buildings as the main memory, presents the trajectory of the times and reveals class differences; his ethical writing depicts the specific form of folk ethics with the intergenerational narrative of public order and family relations; Chronic diseases and the evil of human nature carry forward traditional ethics and folk warmth. The novel has both the “historical” depth and “aesthetic” height of realist creation, which can be called a benchmark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under the realist paradigm.

Keywords: Liang Xiaosheng; *A Lifelong Journey*; historical writing; ethical writing; writing of human relationship; realistic paradigm

收稿日期: 2022-04-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研究”(19ZDA266)

作者简介: 孙桂芝(1977—), 女, 四川金堂人, 辽宁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文学批评;
王志萍(1972—), 女, 江苏南通人, 昌吉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2017年12月,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首次出版; 2019年8月, 梁晓声凭此作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2022年1月, 同名电视连续剧开播并引发观剧热潮。《人世间》以东北为背景, 谱写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世事浮沉和人生百态, 是现实主义范式下又一鸿篇巨制。“现实主义”在当代理论话语体系中具有两大范畴向度: 其一是指19世纪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这一思潮自19世纪末以来, 先后受到现代主义冲击、后现代主义解构, 在20世纪呈现了逐步古典化、边缘化的趋势; 其二是指文艺创作和批评范式。针对古典现实主义思潮的遭遇以及当代现实主义话语应用特点, 周宪提出: “当代现实主义则更加注重艺术再现的形式、技巧和方法, 便把关注的重心从再现的现实本身, 转向了再现的艺术性, 这是当代现实主义范式转型的主要特征。”^[1]他认为, 当代现实主义具有范式化的趋向, 即从具体思潮转型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作为考察文艺创作的方法哲学。王一川说: “现实主义范式, 是指那种秉承客观性、典型性和批判性等原则去刻画当代社会现实的美学态度和艺术再现程序。”^[2]他也同样认为, 若从文艺思潮或者19世纪创作实践的现象看, 现实主义的确已经表现出丰碑式的固化倾向, 但是现实主义作为范式却依然具有很大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空间。梁晓声的《人世间》通过不同城市建筑群的对照, 描绘了东北数代人在社会变革中的浮沉百相, 更在烟火世情中探询了那些渗透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民众基因中的国民经验, 其写作兼具审视和包容的姿态。其在文学广度、深度以及深耕“人民性”的叙事导向等方面, 均呈现“历史的”“美学的”维度与时代性相融合的特质, 堪称现实主义范式下中国当代文学标杆之作。

一、历史记忆: 以城市建筑群为社会进程的缩影

“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面, 书写的是它的文化。”^[3]历史和建筑都是人为建构物, 就属性而言兼具物质性和社会性。建筑以留痕的方式介入历史, 建筑可以记录社会历史的动态变迁, 也可显现社会历史的迟滞与疏漏, 书写建筑就是书写历史。《人世间》以城市建筑群作为历史记忆的

开端, 在民众居所这一空间结构中索求社会历史的纵深性和典型性。小说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A城建筑群的形成起笔, 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近百年。从材质和风格区分, A城拥有城中心及城郊高地、洼地三个建筑群。城中心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流亡贵族建起的独栋或连体楼宇以及马蹄石街道, 沿街商店、书店、电影院、医院等配套建设完备; 距离城中心十几里的城边缘高地的住户是家底不甚丰厚的俄国逃亡侨民, 他们以“板夹泥”为房屋墙体、铁皮为屋顶, 建起一些大大小小的平房院落; 坐落在城郊低矮洼地里的则是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流迁而来、身无分文的中国本土农民搭建的黄泥坯草房。一条铁路把城中心和边缘高地、洼地切割开来, 铁路的那边是A城中心, 这边则是高地、洼地平房建筑群; 他们共享时空, 又各自存在。三种建筑群的居住者的身份也因社会财富、权力结构的差异而裂变, 建筑的显性外观, 包孕着社会结构的隐性本质, 建筑群与居民身份之间就此建立起隐喻的同构关系。根据城市建筑群差异, 《人世间》的叙事者, 以省叙或详叙方式进行对应叙述, 建筑、历史、叙事策略三者间呈现出丰富的张力。

首先, A城中心建筑群保存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流亡贵族的生活记忆, 丰厚的财富让逃亡者在异国他乡也可以复制奢华生活, A城中心在人力、财力还有权力方面都占据城市头部位置, 但作品中的叙事者对这里的情况却隐而不叙, 只偶尔在闲叙中提及。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后, 在铁路这边平房区建造了营地, 及至两年后, 日本军营驻扎期间, 铁路这边“同一地带的中国居民和邻国逃亡侨民, 便都陷入惶恐之境”^[4], A城中心建筑群及居民在作者的叙述中是缺席的; 当苏联红军击败日军并驻扎在曾经的日本军营时, A城中心建筑群的居民在场却保持着安全距离; 及至抗联开始接管这一地区时, A城经历了不同的权力更迭, 但城中心人们的生活场景始终未在叙述中出现, 一条铁路成为有形的切割线和屏障, 所有的喧嚣与不安似乎都只出现在平民区。隐而不叙的叙事形式与A城中心作为社会财富、权力高阶的显要身份相悖, 但是又与他们远离民众、保持静默的样态相符, 《人世间》在叙事策略方面表现出独具匠心的形式隐喻性。城中心居民的

生活状况如何,历史的变迁对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小说仅通过作品中他者的视角从侧面予以揭示。首先是身为底层小人物的周秉昆见识过这里的情形:第一次是他去曲老太太家做客,“那些美观的俄式房屋是他们对幸福生活向往之最,但没进入过。”^{[4]243}这里有地毯、天鹅绒的窗帘,还有20来米的餐厅。“听说过从没吃过”的鱼子酱、大列巴,“从没听说过”的荔枝,“招待他们的红酒,和老百姓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凭票买到的果子酒口感太不一样”^{[4]247}。第二次是秉昆举债兑得一套城中心横街第一条街的房子时,他看到那里“每个门牌号都代表一幢有院子有门房的独栋小楼,闹中取静”^{[5]183},居住在几条横街的住户,越往后的身份越显赫,后几条街的孩子甚至很少和第一条街孩子玩。秉昆和郑娟把这套房子视作天堂,但是对于横街的其他居民而言,第一条街处于权力的最末端,社会权力之差在这里愈加被放大了。除了秉昆这个临时的旁观者之外,周秉义以阶层跨越方式成为城中心深宅的新人,他对妻子说:“我爸至死没与你妈见过面,为什么?因为在我爸和我弟看来,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是权贵人家。”^{[5]360}A城中心经历了战火纷飞、权力更迭的时代,却始终保持着矜持和封闭,历史洪流的喧嚣与横街深宅的静默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反差揭示出民间边缘与权贵中心的巨大沟壑。1950年代,A城修建机场,一条柏油路从A城中心直通机场,机场和柏油路成为A城中心通向外界的桥梁,与底层百姓固守家宅的封闭形成对照。针对A城中心建筑群隐蔽的在场这一历史存在形态,《人世间》的叙事对应以引而不述的省叙形式。透过中心/省叙、喧嚣/静默、遮蔽/他视等重重张力,读者意识到,居住在城中心深宅中的群体尽管被遮蔽于历史风云躁动之外,却又尽享社会发展红利,因为财富和权力为他们带来了庇护、尊贵。

其次,再看向简陋、贫瘠的城市边缘建筑群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他们随历史波动,却被前进之轮疏漏。如果说A城中心以隐而不露的方式存在于历史之流,那么由边缘高地、洼地平房构成的共乐区,尤其是由泥坯、草皮搭建的共乐区光字片区,则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事讲述中位于故事的前端。《人世间》的叙事聚焦在城郊平房建筑群,所有的讲述都从这里开始。1950年代,

平房建筑群定为共乐区,以“光”字结合“仁义礼智信”构成片区各街道名。居于其中的人们生活如何?以周志刚这个周家泥坯房的建造者为例,他是半生献给“大三建”的共和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常年工作在外,只能每两年回家探亲一次。每次回家,周志刚都热衷于用黄泥土修补房屋墙体;退休后,他依然习惯性攒黄泥土,热衷于给自家乃至街道和别人家泥墙作维护。历史赋予他从农民变成工人的机遇,但最终他还是回归到光字片区泥坯房的修缮者这一角色,其人生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周志刚的人生如此,他所居住的光字片区建筑群也是如此。当1950年代A城机场柏油路修好之时,光字片区依然是下雨就泥泞的街道。这一情形持续到2004年。当时,周秉义开始着手完成仕途中的最后一件壮举——拆迁光字片区。2005年十一前,光字片人家全部清空;十一过后,光字片的大拆除全部展开”^{[6]382}。这可以说是从光字片区走出去、成功跨层成为社会权力拥有者的周秉义在履行社会职责,也可以说是他无法面对自己亲人居于灰暗角落“穷人窝”的现实而产生的动情之举。在近半个世纪时光荏苒中,光字片区的住户和建筑群一起处于边缘地带。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东北的发展迅猛而有力。那么光字片区的落后是因为“底层的人们对时代即将发生的改变从来是不敏感的”^{[5]62}吗?作品告诉读者,并非如此。《人世间》详细讲述了居住在共乐区的几代人,如何以服从和配合的姿态经历“近50年里出现过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推荐上大学、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走穴、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动向和重要社会现象”^[7]。光字片区居民们忙忙碌碌地随着历史节奏调整各自生活重心,积极、主动而热烈。然而,直至21世纪初,这里的居住场所除了私搭乱建了更多土坯房之外,别无变化。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形态?问题意识驱动历史诠释和文学叙事,《人世间》的叙事始终聚焦于光字片区,放大这里居民的喜怒哀乐、人生际遇,在光字片区建筑环境中凸显了详叙/静默、居住者/居住环境之间的巨大反差。正是在这种反差中,读者意识到,光字片区问题不是底层民众天生钝感所致,也不是因为这里的居民不渴望更好的居住环境,其根本原因在于,

社会发展的触角虽时时触及他们的生存之道, 但却未直抵他们生活深处。

“历史法, 是在广泛观察社会事实的基础上, 通过综合、归纳, 找出人类生活各种事件在发展上的必然联系。”^[8] 历史法的本质在于比较; 这种比较, 既有同一事物的先后纵向比较, 也有同一时期不同事物的横向比较。面对历史进程, 静默的实质在叙述中逐步澄清, “在理想的社会生态中, ‘民间’和‘庙堂’之间应该有着通畅完善的沟通渠道, 两种精神价值也存在互相转化渗透的可能。不过, 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特殊样态, 使得此类沟通在某些时候产生了延滞甚至阻断。”^{[9][10]} 小说中, 叙事者选择对光字片区这个历史迟滞的区域进行详述, 就是立意彰显宏大进程与沉默迟滞的反差, 在叙事张力中表达出对平民生活的现实关怀。小说作为社会、历史与意识认知的结合体, 其语言和形式无法回避内在的隐喻指向, 《人世间》对建筑群体的书写形式, 具有对位社会结构、突出阶层差异的意味。梁晓声凭着作品深厚的“历史的”视角和张力十足的叙事策略, 在建筑群的对比叙写中, 不断强化一个宗旨: 社会的、历史的发展不只要看向速度和成果的峰点, 还要看向声音微弱甚至沉默的大众群体。那个群体是历史沉淀后的承受者, 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检验者。“有意味的形式”, 使得《人世间》兼具有了“历史的”深度和“美学的”高度。

二、伦理承变: 以代际叙事连通社会与家庭

《人世间》以建筑接驳历史, 在宏大历史与具象建筑的张力间促使时代影像立体化、具体化, 而代际叙事则有效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观在民间进行规训的路径和过程。代际既是一个自然概念, 也是一个社会概念。一方面, 代际由出生日期所限定的历史时刻、家庭、地域构成, 指向生物性、物理性; 另一方面, “代际”则由文化模式决定的经历、话语、经验等构成, 指向社会性、公共性。《人世间》利用家庭代际叙事来展现中国现代民间伦理和权力认知, 不仅写出了中国民间语境中伦理传承的古老传统, 更写出了中国代际关系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更新。

首先, 伦理意识的形构通过民间公训潜移默化

地实现, 具有集体性。“集体记忆承担着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任务, 是民众形成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现实。”^[10] 《人世间》中, 建筑群、街区命名负有公众伦理形构的重任。“共乐区”包括俄国流亡小地主的平房和中国农民的泥坯房, “共乐”暗含不同地缘、阶层既要各安其居又能和谐相处的社区结构安排; “光字片区”泥坯房建筑群, 贫瘠的生活环境因“光”的命名被赋予社会价值观的光晕; 再聚缩到泥泞、狭窄的五大街道, 其周遭建筑生态环境逐级下降, 但是“仁义礼智信”五大最高道德规范却使简陋的街道变得光明、高大起来, 在文化暗示和规约中冲淡、抑制艰苦环境在底层群体中引发动荡的可能性。

“一个拥有建筑、街道和灯光等物理意义的空间呈现, 更是文化上感受的结构体。”^[11] 因此, 当伦理通过依附于公共区域的方式实现代际训诫时, 街区的划分和命名除了承载历史变革的适应性外, 还可以是一条稳定的民间道义传承脉络。恶劣的生活环境在伦理文化塑型下, 反而具有了道德典范的召唤力。由此, 在“文革”刚开始, 当年轻一代民警主张把光字片区的“仁义礼智信”名称改了时, 老所长坚持认为, 改街道名会导致民间伦理结构遭受重大冲击。文化、习俗具有化人的作用, 历史中沉淀、积累下来的集体智慧和经验常利用公共环境进行赋义和规诫, 因势利导地使得居于其间的人们一代代地受到滋养、训导。当然, 这也正是光字片区集体搬迁的新址被命名为“希望新区”的根本原因——“仁义礼智信”留在文化遗产中, 未来则寄托在“希望”里, 居住区名称的符号所指透露出管理阶层试图进行伦理引导的意向。

其次, 伦理传承还必然呈现在私语境的家庭代际关系中。“‘家庭小说’的重要结构特征是对交互存在的个人、家庭历史和民族/国家历史的承认, 而这一点同样也是他们认知策略和情感状态的基础。”^[12] 对于周家而言, 做个“好人”就是最高伦理原则, 这种认知以家风方式完成传承。周父由农民转型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 他的身份兼具了农民与工人双重属性。他以挺直腰板、不卑不亢的姿态面对高官亲家, 根据周家人有恩必报的道义感, 转变了对秉昆娶寡妇一事的态度, 更在教会秉昆如何维护房屋墙体后, 以亲自送秉

昆去郑娟家的举动来示范何谓男人的道义和担当,使得优良的“好人”家风在言传身教下得到延续。第二代的周秉义作为长子,坚持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爱民的责任担当,在军工厂改制、光字片区拆迁中克己为公,为拆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秉昆作为叙事者偏爱的人物,成长过程有光字片区“仁义礼智信”的熏陶,有其父作为工人阶级不卑不亢的“家风”教育,更有书籍的陪伴和引导,他也终于从懵懂的小跟班,成长为作品中的核心人物。及至第三代“楠楠”,他在异国他乡做出了勇救他人的英雄举动,这也是他从小在周家成长、耳濡目染“好人”信条而形成的优秀品格的显现。作品中,周家三代人薪火相传着“好人”家风。在作者梁晓声看来,那些寻常、质朴、善良的底层百姓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义最好的承接和延续者。

再次,伦理意识的中断或变迁则显示出社会外力的介入。周父作为在A城立足的周家第一代,他的秉性和家风规训深刻地影响到妻子和儿女,但周父的社会认知也并不是恒定的,他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念。周父首先经历了从小农意识向工人身份认同的趋善升级。起初,周父说:“混蛋!有正经的小伙子和寡妇搞对象的吗?”^{[4]395}这是传统男权对于女性贞洁占有意识的执念。当他长大后对儿女渐渐失去掌控力后,他“挺享受”自己对脑子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的老伴的震慑力,“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仍有无可取代的特殊价值。”^{[5]79}当然,他要求秉昆再生一个亲生孩子也是源于血统上传宗接代的思想,这些都是旧时代乡村文化中家长制、男权制的表现。周父以“大三线”第一代建筑工人身份走南闯北,眼界也不断开阔起来。他开始对自己和家人提出更高的道德标准,比如,房屋尽可能修缮,院子里要种花改善环境,儿女要好好读书考大学,不打知识分子,讲民主,等等,这都是周父随着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观念转变的结果,具有自觉的趋善性。

周父的更大转变则是晚年对社会权力权威性的认可和妥协,这一转变在周家三代身上得到共同确认。“作家在书写个体命运沉浮的同时,也在书写整个时代的变迁。”^[13]起初,针对长媳冬梅的母亲不来拜访的事情,周父在接受事实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情绪,他怒斥道:“我

们周家很有出息的长子做了她的女婿,我认为也是她们母女俩的光荣。”^{[5]327}在此,他表现出工人阶级极强烈的自信、自尊。周父看到不同阶层地位给后代带来的巨大人生差异后,主动同意外孙女投靠舅舅。对一起住进亲家的洋楼一事,他“不但不反对,反而特支持……生活在良好的环境中有益于下一代的身心成长……希望玥玥的性格以后像冬梅”^{[5]327}。周父的这一转变是社会权力结构对家庭道义、伦理认知进行改造的结果。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也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父经过了挣扎、抗拒,思想观念最后发生转变,承认农民、工人阶级身份带来的荣耀抵不过阶层权力的诱惑,秉义、秉昆和周蓉、郝冬梅等下一代则以知识和智慧为最高追求,会克制地、有选择地借助权力达成自己的追求。到了周家第三代玥玥和楠楠、聪聪时,他们对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充满显见的向往,也愿意做出主动示好权力、财富的举动。“‘社会变迁’,一般被认为由两种变动性力量的组合完成。一种是个体的生活机遇与认同意识的变动,另一种则是社会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变动,两者共同发生作用,影响推动着社会的变迁。”^{[9]104}在时代转型、道德规范与社会权力多重影响下,周家三代人在面对底层身份、知识以及权力、财富时,出现价值认知的明显迁移。的确,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社会权力对民间伦理的渗透和干预是必然的。

“‘小说是国家或民族的秘史’,所谓国家的秘史,就是民间记忆,民间记忆在书本之外,所以小说要把民间记忆呈现出来。”^[14]代际关系的变迁作为小说叙事明线,映射的是权力对伦理的规约、引导甚至改造。《人世间》通过对周家几代人的居所环境、代际关系的讲述,展示了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发展变革在民间留下的印记。同时,代际就是一座冰山,矗立在海面之上那部分是显性的,会受诸多外力干预甚至改变——趋善或者世俗化,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则沉潜海面之下,并定格为中国人伦理基因。梁晓声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是深刻而细致的,《人世间》中光字片区居民的遭遇、周家的故事,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缩影,既揭示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伦理底蕴,也展示了时代变迁及权力辐射下民

间记忆的样态。

三、世情采写：以人性深描提供现实思考

历史与伦理的书写源自对世情的观察，也将返身于对世情的思考与关切。所谓世情是指民生、民情与世俗人性的共同体，《人世间》现实主义范式还指向小说中世情采写的文学谱系和审美蕴藉。出生于哈尔滨市的梁晓声，19岁时成为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下乡知识青年，并在黑龙江生活了7年。从那时开始，他学习和初试写作，东北的水土和气息浸润了梁晓声的骨血和生命，自然也造就了他文学中“东北文学”的根性。“东北文学”作为一个场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是不可小觑的存在。首先，从创作者群体属性看，生于20世纪初的“东北作家群”和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东北作家群”具有地理亲缘性，黑、吉、辽三地是他们出生、成长、书写之地，“东北文学”文脉绵延近百年。其次，从创作内容看，采写东北人与事而成的作品类型丰富，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东北乡村民众群像、抗日战争中东北人的不屈抗争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青东北生活场景，这一类作品可称之为乡土文学；以20世纪80年代城镇化推进、工业转型为背景采写东北民生与民情的作品，可称之为东北工业文学。及至21世纪，东北籍的子一代作家，尤其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80后作家热衷书写“铁西区”“工人村”“艳粉街”，书写重工业基地转型中人生沉浮印象。因此，凭借和东北相关的个体生活经验以及文学创作地域特色，梁晓声作品自然继承了“东北文学”的风格及底蕴。

《人世间》中世情的采写，其一就是延续“东北文学”关于地域民风、民情和民俗的描述及批判格调。“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15]20世纪20年代，鲁迅等作家投身文学创作，试图以小说和戏剧开新民之风。在鲁迅影响下，萧军、萧红等作家以故乡东北为写作场域，描写那里的民众作为看客的愚昧、迷信。《人世间》多处叙事表现出对20世纪上半叶“东北作家群”作品批判基调的承续。首先就是关于“看客”的当代摹写。小说中，涂志强被执行死刑之时，不仅成百上千人等着围观，更有一些人特地骑着自行车赶来，“为的是看个自始至终，不错过任

何细节。”^{[41]6}“看客”有时也会隐而不露以瞥一眼的方式出现，比如当秉昆入狱，郑娟照顾周母期间，“那各种大同小异的目光，任何人都会感到如芒在背。”^{[5]7}“看客”们并没有因为鲁迅、萧红等人的谴责而消失，民众骨子里的“看客”癖好依然活跃，历史发展、社会变革乃至城市人的身份都无法撼动这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与“看客”姿态相随的还有迷信心理。秉昆妈从植物人状态醒来后脑子糊涂了，把郑娟当作“九尾狐狸精”而不断叫骂。春燕妈认为，秉昆妈被妖魔附体，“附体的可能是只丑黄鼠狼，还是母的。”^{[5]32}为此，按照民间救治经验，她一个大嘴巴子抡过去扇醒了秉昆妈。秉昆妈是幸运的，没有象萧红笔下的团圆媳妇一样被土法治病折腾致死，但是这种幸运并不能抵消迷信习气的蒙昧性质，叙事者也忍不住在故事之外插语“此法居然真灵”，“居然”二字传递出十足的反讽意味。半个世纪来，现代化的机场、柏油路、工厂陆续建成，但狐仙怪力传说还如影相随在民间流传。民俗的形成是长期积淀的，那么改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直击人性之恶可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宣扬社会主流的、美好的、温情的一面，则足以抵挡人性暗藏的、灰色的部分。梁晓声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通过深刻而生动的作品，引导人民继续发现、认识自身不足，然后朝着更进步的、更好的方向发展。正是这种立足东北世情，直面社会痼疾却不放弃救治的写作倾向，使得梁晓声作品具有典型的“东北文学”质性，可被纳入“为社会而写作”的“东北文学”乃至中国百年文学谱系。

《人世间》中世情的采写，更浓郁的笔墨被置于书写民间自发的、深切的温情。梁晓声绘制的尘世百像图中，有攀附权势、窥探他人、自私算计的人物，但这些人只是如蜻蜓点水般在作品中轻写淡绘，他更多的笔触用于对“人世间”的浓郁温情和民间道义进行摹刻。《人世间》中卑微和崇高的矛盾化身首属郑娟的养母。郑母很卑微，她靠卖冰棍为生，收入微薄，当秉昆帮她扶正推车后，她反复表达感激之情；当郑娟拒绝秉昆送的鸡蛋和钱时，郑母哭着“可怜兮兮的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像已完全丧失耻辱感的老乞丐”^{[4]94}。然而，就是她，收养了郑娟，又收养了盲人光明，靠自己微弱的力量守护心中那份崇高的善良。郑

母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士, 贫困、卑弱却善良、坚韧, 身份卑微却心灵崇高。秉昆妈、春燕妈等也都是这样的存在, 她们照看自己的儿女, 又力所能及地照顾着身边邻居。同样, 秉昆继承了父辈慷慨仗义的行为处事风范, 与赶超、国庆等因道义而结为朋友, 艰难的生活经历更磨砺了他和朋友们之间的情感。他们窘迫中有些许的快乐, 妥协中有守正, 无论是出于情义, 还是抱团取暖的需要, 他们的言行都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摆脱生活困境、尽力追求美好的向善情怀。“不但要表现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 也要示范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16] 梁晓声希望通过文学实现“好人文化教育”的净化功能, 他的作品笔力厚实、审美底蕴深刻。

近百年期间, 东北地区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炮火洗礼, 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 但20世纪80年代后, 东北地区遭遇了社会转型的阵痛, 在21世纪的当下, 更面临着与沿海地区巨大经济落差的冲击。以东北作为叙事场域的乡土文学或者工业文学具有断代史性质, 横切面细致入微却难以完成对东北烟火气息的全景观察。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 梁晓声凭着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对东北社会生活的切身经验, 以纵深的历史感叠加有意味的叙事形式创作了《人世间》这样一部长篇巨制, 其作为“一种‘艺术而雄辩’意味的存在, 是不容否认的一种文本事实”^[17]。《人世间》指引读者看向历史、社会以及居于其间的、具体的民众, 在其笔下, 小人物们齐聚在一起成为了东北百年“客观性”“现实性”“典型性”镜像——乡土与工业、旧根性与现代性、权力与伦理、蒙昧与温情交汇于此, 宏阔而真实。《人世间》叙事表象之下是深刻的社会价值追索。梁晓声在看向历史与社会, 看向寻常民众生活时, 审视人性, 却不怀疑人性, 其既保持着冷静观察、深入剖析的历史反思意识, 又着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的深厚底蕴。他践行文学为社会、时代书写, 为人民书写的创作宗旨, 作品兼

具“历史的”深度和“美学的”高度, 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堪称现实主义范式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标杆之作。

参考文献:

- [1] 周宪. 再现危机与当代现实主义观念[J]. 文学评论, 2019(1): 33.
- [2] 王一川. 当前中国现实主义范式及其三重景观[J]. 社会科学, 2012(12): 167.
- [3] 梁晓声. 真历史在民间: 追寻一个人类大种群的心灵轨迹[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 287.
- [4] 梁晓声. 人世间: 上部[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 [5] 梁晓声. 人世间: 中部[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 [6] 梁晓声. 人世间: 下部[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 [7] 杨泽松. 卑微与崇高: 从《人世间》看梁晓声的新中国平民画像[J]. 名作欣赏, 2021(7): 93.
- [8] 黎民, 张小山. 西方社会学理论[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5: 27.
- [9] 卢楨. 与时代同构的平民生活史: 论梁晓声《人世间》[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0(2).
- [10] 邹煜, 卫酉祎. 记忆与国家身份建构: 电视媒介抗击疫情报道中的概念隐喻分析[J]. 当代电视, 2022(2): 78.
- [11] 温江斌. 建筑景观、街头记录及其“情感结构”: 1930年代上海海报的都市图像呈现研究[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1): 121.
- [12] 阿莱达·阿斯曼. 记忆中的历史: 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M]. 袁斯乔,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54.
- [13] 刘小波. 个体叙事、时代描摹与精神探询: 罗伟章小说的三个维度[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2(2): 120.
- [14] 梁晓声, 沈雅婷. “踏踏实实地运用现实主义”: 梁晓声访谈[J]. 名作欣赏, 2019(11): 27.
- [15] 梁晓声. 微观天下事 不负案头书: 做一个平凡的人心怀天下[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8: 272.
- [16] 梁晓声. 人的文学: 历史真实、现实主义及其他: 兼致李玲教授[J]. 中国文化研究, 2020(2): 4.
- [17] 王春林. 《人世间》: 民间伦理立场与史诗性书写[J]. 中国文学批评, 2019(4): 24.

责任编辑: 黄声波